

“扫黑剧”的三次转向映照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由《狂飙》热播说起

肖军

近期，一部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电视剧《狂飙》热播，凭借紧凑的故事节奏、精湛的演员演技和宏大的叙事背景成功出圈。近年来，反映同类主题的影视剧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借案件来彰显公义。这些影视剧不仅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还彰显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与时代同步、与现实同行。

从法治角度来看，扫黑除恶影视剧叙事内容经历了三次转向。观众在观看影视剧的同时，感受到了我国的法治进程，影视作品成为了最好的科普媒介。

转向一：

从办理普通刑事案件到加大力度办理涉黑涉恶案件

《扫黑风暴》《对决》

2022年上半年播出的《对决》借角色之口强调，我们现在办的案件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涉黑涉恶案件。这类案件跟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同，我们要全方位地研判所有与陈锦辉、陈锦发陈氏兄弟相关联的案件，确定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全面收集涉及他们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的证据，为下一步的起诉、审判打好基础；而关于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等问题还要重视和检法机关的沟通。在剧中，中央督导组在督办风州市涉黑涉恶案件时强调，涉黑涉恶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强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日常监管，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2021年播出的《扫黑风暴》也是从一开始的刑事案件转向涉黑涉恶案件侦办，如麦自立埋尸案、杨冬菜霸案等。

这一个转向，看起来反映的是侧重点的不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直接反映，还人民群众一片净土。

转向二：

从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到开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罚罪》《巡回检查组》《扫黑·决战》

2022年下半年播出的《罚罪》，以开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主线展开叙事，表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办案机制与以往打黑行动的区别，即除了要铲除黑恶势力，还要打伞破网，扫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改善基层的政治生态；黑恶势力的扫清，还要直指基层腐败、官商勾结



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中法治内容的三次转向，体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变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法治化进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

右图为电视剧《扫黑风暴》剧照



右图为电视剧《扫黑风暴》剧照



《狂飙》(上图)中，张译(右)与张颂文(左)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该剧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提出，扫黑除恶要在专项斗争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

左图为电视剧《对决》剧照

转向三：

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扫黑除恶常态化

《狂飙》

《狂飙》开篇便是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表彰总结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大会，开宗明义地提出，扫黑除恶要在专项斗争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常态化的同时对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

这个剧情，对应的是2021年3月召开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这也为本剧奠定了总基调，即剧情围绕着扫黑除恶常态化展开。剧中有一

个情节，退休干部黄老对徐忠的工作表示不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结束了吗？徐忠以拉家常的方式向他解释说，扫黑除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常态化。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的“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此处得以借剧情向观众普及。

此外，《狂飙》反映了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情况，如在第4集、第13集片头，以旁白方式说明：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人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非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十年

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这一段表述所呼应的，正是2021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剧中这场政法队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

该剧在后半段也是围绕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展开叙事的，比如专案组在收集强盛集团犯罪团伙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证据的同时，还要求京海全体政法队伍自查自纠，每一名公务人员都要填写自查表。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扫黑除恶常态化并与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扫黑除恶工作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效率与效力，更好地诠释了两项工作之间的联系，在观众展示出国家最新方针政策的同时，全面构筑起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石。

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中法治内容的三次转向，体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变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法治化进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影视剧叙事重点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该类型影视剧是根据全国扫黑除恶过程中的真实案例和所处阶段的经历改编。内容的三次转向，不仅反映了国家扫黑除恶的决心、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还对黑恶势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对广大民众起到了警示作用，更是将法治宣传教育贯彻到底，对观众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接受法治教育的契机。

艺术是一个表现形式，叙事是为弘扬法治服务的，为观众展现出扫黑除恶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部分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每个公民都要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正如《狂飙》中讲到，治安与治理，虽然一字之差，但差别巨大。影视剧告诉公民（观众），每个人都是治理的主体。公民（观众）不仅要时刻牢记法律的界限、遵守道德的底线，还需要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作贡献。唯此，才能齐心协力共建平安中国，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新观察

从年度榜单看当代文学场的“三分天下”

霍艳

又到了各大文学榜单揭晓的时节。上榜代表着谁更受到读者欢迎，也预示着谁有可能成为经典。观察年度文学榜单，也能透视文学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文学榜单分为四种：一种是带有官方色彩的，如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第二种是由读者评选的，如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第三种是由期刊和网络媒体评选的，如文学杂志《收获》、学术刊物《扬子江文学评论》以及“腾讯好书”“凤凰网读书”等，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也出现不少“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最后一种是出版机构、销售渠道的排行榜，如各大出版社的十大好书、京东图书年终榜单等。

从排行榜的主办方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场已三分天下，以各个学会、文学刊物代表的官方文学组织，以报纸、网站、公众号代表的媒体体系，以及豆瓣、知乎代表的网络民间话语场，它们共同造就了当下生机勃勃的文学环境。同时每一个榜单的揭晓都是一次阐释权的竞争。

期刊评选出的文学榜单仍集中于纯文学作品，以“文学性”为衡量标准。榜单以文体分类，评委由高校教授、活跃评论家、期刊主编等专业读者组成，缺少了普通读者的参与。扬子江文学

评论排行榜里，贾平凹的《秦岭记》登上长篇小说榜首，迟子建的《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位列中篇小说榜第一，潘向黎的《兰亭惠》摘下短篇小说榜第一，胡弦的《江都的月亮》和王彬彬的《“荒林拾叶”专栏》分别领跑诗歌榜与散文（含非虚构）榜。收获排行榜里，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位列长篇小说榜首，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摘下长篇非虚构榜第一，王安忆的《五湖四海》与弋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分别领跑中篇小说榜与短篇小说榜。这些榜单有不小的重合性，如孙频《榫棠之约》、王安忆《五湖四海》频繁出现在各大文学榜单里。上榜作品多来自于各大文学刊物，而文学刊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式微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近年它们努力通过新媒体化寻求突破，但真正阅读文学刊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仍在减少，纯文学作品难以出圈。发布文学榜单就成为一场新媒体上的“文学事件”，吸引读者的关注。

媒体的文学榜单则更凸显评委的个人色彩，评委主要由学者、媒体人、书评人组成，他们既是专业读者，也熟悉大众趣味，在文学品质与传播效力间寻求平衡。评委因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有着审美的差异，在评选的过程中相互

角力，在一轮一轮有策略的投票中做出平衡。他们通过撰写推荐语的方式，将作品与自己的推荐直接关联，以一种象征资本参与文坛新秩序的建立，尤其遇到一部作品有多名评委推荐，选用谁的推荐语也成为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一些媒体还会将榜单进一步分解，变成评委个人的年度好书发布，将评委价值发挥到最大，也让更多的作品上榜以增强影响力。

豆瓣网依靠积累的数百万用户，在文学方面已成为国内信息最全、用户数量最大且活跃度最高的读书网站。豆瓣用户自发的评价、评论，形成了一股新兴的力量，直接影响到图书的销量，“豆瓣高分”成为年轻人阅读的重要参考，也逐渐被主流媒体所采用。当打通了阅读、消费、评价的环节，豆瓣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经典坐标，排行榜就是它的表现形式。

豆瓣排行榜的特点是它并非单一的文学排行榜，还有社科、科普、艺术、经管、绘本等门类。在文学榜单里，又按地域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按题材分为小说、非小说、诗歌，按类型分为科幻、奇幻、推理、悬疑，显示出年轻一代阅读的多元性。

在“2022年度图书”里文学类上榜的有张天翼《如雪如山》、杨本芬《我本

芬芳》、本哈明·拉巴图特《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等，纪实类排名最高的是《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而纵观整个榜单，排名第一的是上野千鹤子《始于极限》，排名第六的是《看不见的女性》，排名第八的是《应得的权利》。从中可以发现一个奇妙的关联，即它们共同呈现了“议题向”这一特点。除了上述作品涉及的对性别的关注，还有如何认识复杂世界、文明冲突，如《雨林里的消亡》《中亚行纪》，如何回溯历史，如《漫长的余生》《现代中国的形成》，如何对待生活，如《毫无意义的工作》《贫穷的质感》，以及如何认识自己，如《感知·理知·自我认知》《论爱欲》。豆瓣的榜单呈现了年轻人关心的方方面面，他们有着外国文学榜单头名《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式的疑问，需要以阅读作为窗口重新认识世界、现实、自我，也渴望一部作品能以文学的形式，把他们所关注的议题融入其中。年轻人心中“文学”的外延正在扩大，更强调文学对于认识世界、完善自我的功用性，希望文学提供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引发思考。单独设立外国文学榜单则显示出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从世界的历史、周边的现实两条脉络寻找资源。

在豆瓣榜单发布之后，还会生成一份个人阅读报告，用户可以检视自己一

年的阅读情况，然后根据榜单进行查漏补缺。这时榜单就发挥了多重作用，既提供阅读选择的指引，也帮年轻人找寻共鸣，产生一种关注相同议题的共感，阅读成为与他人连结的方式。

京东的图书榜则完全依据销量，并不刻意强调是当年出版的新书，在总榜TOP100中，大约有20余种是2022年的新书。缺乏了“新”作为保护，使得作品被放置在更大的坐标里，与经典、畅销书竞争，新书的脱颖而出取决于它能否为读者提供新鲜的经验和交流的话题。在文学类榜单里，占据前三位的是《三体》《平凡的世界》《活着》，而新书上榜的是王朔的《起初·纪年》，以及讲述孙海洋寻子经历的《回家：14年又57天》。值得一提的是，《起初·纪年》尽管转化为了文学消费，但在年轻读者、专业读者层面并没有收获良好的口碑，因此没能登上豆瓣榜和纯文学榜。

纵观各大文学榜单还发现一个特点，即视野越来越拓展到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创作，比如执教于香港的葛亮新作《燕食记》，就在多个榜单登场，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每年也保持着稳定的创作水准。榜单视野的拓展有助于促进不同地区的华语创作相互交流，也使得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作为每年例行上演的“文学事件”，不同的文学榜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豆瓣的榜单更强调议题性，文学刊物的榜单以文学性为考量，媒体的榜单寻找大众性与文学性的融合，销售渠道的榜单则体现文化事件转化为文学消费的能力。这些排行榜成为一种宣传渠道，不光增加了作品的曝光率，促进了文学消费，也为日后的文学奖评比提供了参考。同时，文学排行榜的发布有着越来越频繁的趋势，豆瓣的“最受关注图书榜”每周更新，“探索灯好诗”以月度发布，京东排行榜数据实时更新，它们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四年一届压缩为每周、每月，给文学带来曝光度的同时，也引发了从业者的一种焦虑，从“文无第一”变成时刻要被进行比较，更多涉及到文学之外的因素，是动力也是压力。

而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榜单，文学性仍放在首位，也要反映出文学与生活的连结，它应该是包容的，囊括海内外和各类型文学创作，也应该是公正透明的，不是小圈子的游戏，它能辐射到广泛人群，引领人们通过文学对世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